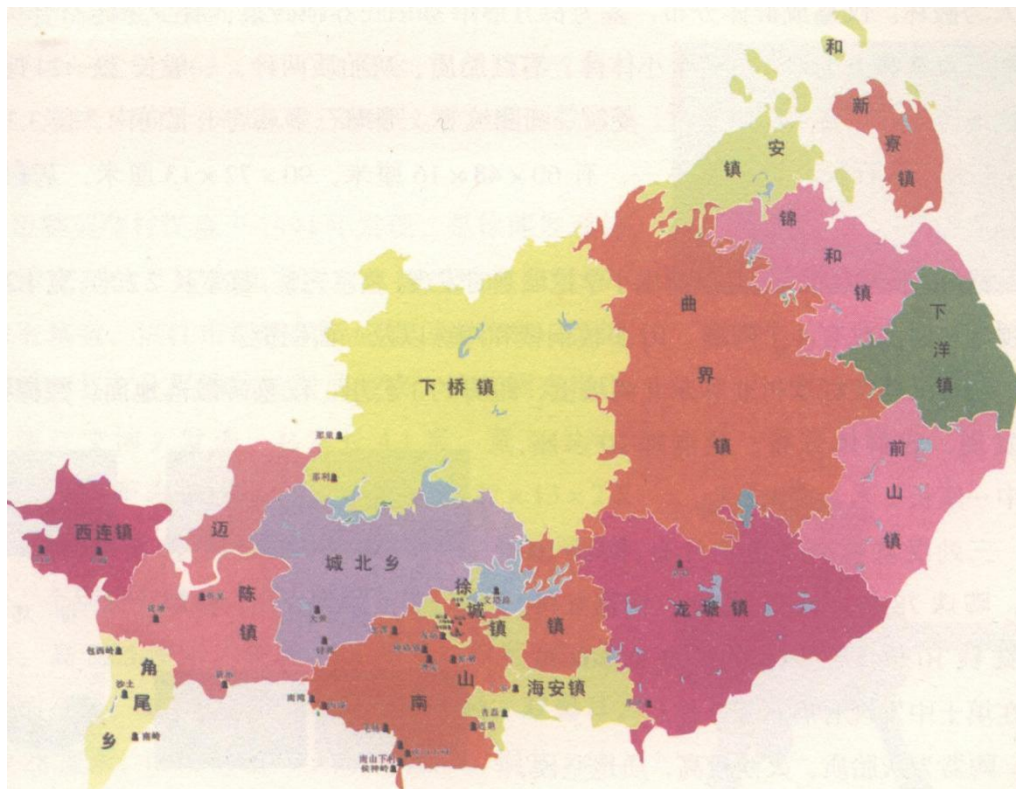


## 徐闻汉墓群

### (一) 徐闻汉墓群基本概况

徐闻汉墓群的发现始于1962年，省、市、县联合组织文物初查，在曲界愚公楼大队深井附近发现了一面北流型铜鼓，徐闻中学历史老师叶宗海带领该校学生考察和发现徐闻县城的南坛园村和石岭汉墓。于当年底在徐城潮州会馆（当时的文化馆）主办了文物展览。

1973年冬至1974年春，广东省博物馆会同湛江地区文化局在徐闻进行了一次文物调查，并在迈陈公社华丰村、龙塘公社红坎村和附城公社（今南山镇）槟榔埇村三地发掘了51座东汉墓。参加这次工作的有：广东省博物馆吴振华、何纪生、赵金顺、杨少祥，湛江地区博物馆黎智波、鍾绍益，阳春县文化馆柯池，海康县文化馆邓杰昌和徐闻县文化馆邓开朝、吴增、姚秀琴等同志。



徐闻县汉墓分布图

20世纪80年代初期，徐闻县组织全县文物普查，发现发掘汉墓39座，纵深进入到县城华建糖厂，县西石岭潘宅、角尾乡南岭村。

90年代，汉墓文物陆续出现，如迈陈英斐汉墓、海安广安汉墓、徐城英舍埇汉墓、南山汉墓、二桥东岗岭汉墓等等。

华丰村华丰岭汉墓群（20世纪70年代发现发掘）51座，分布范围达1000平方米范围，主要集中在华丰村西部。由于水土流失，汉墓大部致露，墓砖散布地表，均受到人为破坏。汉墓成群体分布，多为长方形单室平底券顶砖墓，有少量砖石合构墓、珊瑚石室墓

和土坑墓。墓砖个小体薄，有红胎质、灰胎质两种，一般长 22—24 厘米，在楔形砖（券顶砖）印米字纹、菱纹、圆圈纹等。珊瑚石室墓均坐北向南，长 3.3 米，宽 1.8 米，墓石长、宽、厚不一，有 60×48×16 厘米，90×72×13 厘米，灰白色，体轻质脆。

城南槟榔埕村汉墓，是槟榔埕小学挖墙基时发现，墓室完整，墓室长 2.2 米、宽 1.2 米，墓顶砖室西侧放有 4 个陶罐、10 多枚铜钱和陶珠以及一面铜镜。

红坎汉墓在红坎村北和东北高坡上，距海约 1 公里。汉墓砖散落地面，经探铲探测发现，成群体分布，共清理 20 多座，其中一座长 2 米，宽 1.2 米。

三处汉墓群出土遗物计有：陶器 103 件，陶珠 78 枚，铁器 26 件，铜器 8 件，五铢钱 10 枚，银饰 4 件，珠饰 308 粒，另在填土中发现有肩石斧 2 件。

陶器为灰胎质，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器表大都挂一层黄褐色薄釉。其中夹沙陶釜 1 件，陶器纹饰最多为方格纹加长方形戳印，还有弦纹、水波纹、篦点纹。釜 21 件，方格纹罐 31 件，其他纹饰罐 36 件，盆和圈足盆 8 件，钵 4 件，小釜 1 件。陶珠 78 粒（为陶纺轮、陶网坠）。

铁器 26 件，锈蚀严重，有斧、凿、刀、鱼钩和发钗、指环。其中斧 5 件、凿 2 件、刀 10 件、鱼钩 1 件、发钗 1 件、指环 6 件。

铜器 8 件，有盆、碗、镜、器盖和箭镞。其中盆 1 件、碗 3 件、镜 1 件、器盖 1 件，箭镞 2 件、五铢钱 10 枚。

银器有手镯 1 件，指环 2 件。珠饰 308 粒，种类有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

而后，广东省博物馆编写考古调查报告《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于 1995 年发表在国家《考古》第 4 期。

角尾乡珊瑚石室汉墓，于 1988 年 1 月 30 日发现，主墓坑 1.3×0.62×1.00（深）米，



坐北向南，次坑 $0.5 \times 0.6 \times 1.00$ （深）米，墓石四方形，最大为 $62 \times 51 \times 12$ 厘米，出土陶器7件，陶缸、陶钵、陶罐、双扁耳，饰网纹加方格形戳印，施薄釉。

近陈英斐村汉墓于1994年发现，是徐闻发现的一座较完整的汉砖室墓。该墓已被当地村民破坏，仍留有墓室，湛江市博物馆阮应祺、姜欣利、张继海和徐闻县文化局博物馆派员考察，该墓调查报告在《湛江文博》发表。墓室长4.1米，宽1.42米，深1.22米，距表土70厘米。券顶，砖 $27 \times 13 \times 2.3$ 厘米，竖5，横6，横三层，铺地砖两层，每层厚2.8厘米，个别砖有绿釉。出土陶罐3件，残2件。1件完整，高22.5厘米，腹径13.8厘米，口径12.5厘米，饰弦纹，双扁耳。1件（残），束脰，双扁耳，腹径28厘米，口径31厘米，高24厘米。铜盆1件，铜釜1件，铜壶1件，壶高30厘米，腹径22厘米，口径1.25厘米，口腹均饰双环耳，上挂铜链13环，腹饰十道弦纹。铁剑1把，断为三段，双刃，长49厘米，宽3厘米。

海安广安汉墓1995年9月发现，属汉代小薄红砖券顶单室墓，规格不详，因被掘土机破坏，经清理，出土陶器、铜器。

陶器5件，陶钵2件，其1已残。陶豆1件，陶罐2件。陶钵灰胎质，口径18.5厘米，高8厘米，底径8.5厘米，施薄褐釉。

陶罐，灰胎质，腹径24厘米，高9.5厘米，底径16.5厘米，腹部饰两道弦纹。另1件残，灰胎，饰双扁耳、水波纹、弦纹。



双扁耳三足陶缸



汉铜三足釜



小陶钵

汉代陶罐



陶纺轮（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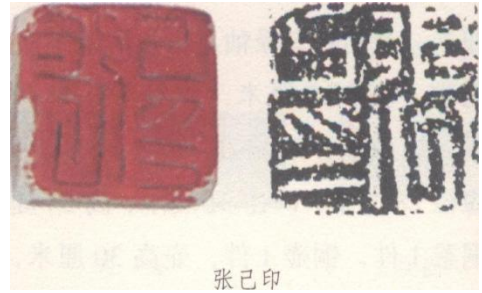
陶纺轮（二）

陶豆，灰胎质，径27厘米，高9.3厘米，饰一道弦纹。另陶纺轮2件。

铜器6件，其中铜镜1面，铜印1件，“大泉五十”铜钱4件。铜镜径11厘米，厚0.5厘米，镜背6晕，四乳钉，中有方廓，圆钮座，桥钮，钮外为双线方廓，廓和铭文圈之间饰四乳钉；主题纹饰为四个L形，两种符号和似卷云纹的简单纹饰，铭文圈内无铭文，只饰芒纹，外为一圈三角锯齿纹，一圈折皱纹。铜印，1.1×1.1厘米，桥钮，残高0.6厘米，印文小篆为“张己印”三字。

“大泉五十”铜钱，径2.7厘米，中廓0.9×0.9厘米，3枚已残，仅1枚完好。

2000年10月24日在徐城镇西门村后大坡抢救清理了一座汉墓，墓道全长3.45米，宽1.62米，深0.75米，为小薄红砖券顶墓，封口发现珊瑚石，墓道中发现动物骨植，共出土玉石珠6枚，水晶珠1枚，玛瑙珠1枚，铁带钩1件（残），陶纺轮4件，铜项圈（径19厘米）1件，铜钱5枚，铜镜1件（径15厘米）（残），铜碗（径7.5厘米）圈足。据分析，该墓墓主为女性，出土的珠饰全为舶来品，是海外贸易的物证。



张己印

2001年7月12日，台风“榴莲”过后，徐闻五里乡二桥村后那涧堰闸东坡汉墓和城南乡海珠港村西高坡汉墓濒于崩塌。湛江市博物馆阮应祺馆长领队和遂溪博物馆和徐闻文化局、博物馆派员联合抢救清理。那涧堰闸东坡汉墓是座较大型的典型汉墓，墓道全长4.63米，宽1.6米，深0.8米起拱，通高1.7米，底三层铺地砖，两端有封门。墓道左侧发现人为缺口，券顶全部崩塌，似为早年被盗所致。墓葬出土怪兽纹铜铺首1对2件，五铢钱8枚，小陶罐1件，陶灶1件（残），陶屋1件，屋内有舂碓俑2件，陶三足釜1件（残），陶提箫、陶壶盖4件，方格印纹陶片1件，该墓墓砖有楔形券顶砖，砖长30厘米，宽15.5厘米，厚4.5—6厘米不等，所有墓砖均饰一面几何图纹，几何图纹种类达7种以上。此墓是迄今为止粤西地区发现的最大汉墓。



那涧堰汉墓清理现场

海珠港汉墓是小薄红砖券顶长方形砖室墓，青石铺底，长3.5米，宽1.7米，深1.5米。墓道壁墙用三层砖叠砌，出土陶屋1件，陶井1件（残），陶杯1件，铜镜1件（残），陶器盖2件，1件有环，网丝纹陶器碎片3件。

以上两座墓葬均出土完整陶屋、铜器，表明墓主身份地位非同一般。

由于徐闻汉墓分布较广，沿海村庄海洋经济开发，大量的汉墓文物频频出土。较典型

由于徐闻汉墓分布较广，沿海村庄海洋经济开发，大量的汉墓文物频频出土。较典型

的有：龙首铜勺（司南），双鱼朱雀纹铜盘、铜鼎、铁釜、铁剑、“宜官”“帝君百石”“曲目”铭文砖，陶牛、陶熏炉、陶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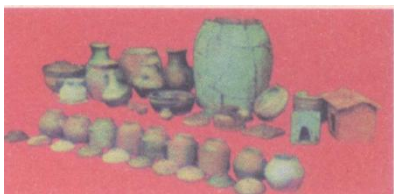
2000年7月，在大黄乡社朗仔村出土铜鼓1面，出土时倒置，周围有红砖片、炭渣、火烧土。铜鼓有点儿破残，但基本成形。鼓面径27厘米，胸径35厘米，鼓腰径28厘米，鼓底敞沿，径37厘米，鼓腰对称饰四扁耳，鼓腰鼓胸饰直条纹。鼓腰扁耳上端饰一只小蟾蜍（青蛙），鼓面无晕，中饰十芒太阳纹，阳心径3厘米，芒外径16厘米。鼓面还饰有六点纹饰，可惜被砸平。此鼓属中国南方五省保留的八大类型铜鼓之一，似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鼓型，鼓体较小，鼓身刻纹粗简，此类型鼓是从古釜形制转化过来。它的族属当属濮越或布越，属西汉中晚期遗物。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的铜鼓形制相似。



徐闻大黄社朗仔出土的楚雄万家坝型铜鼓

2001年10月，在徐城贵生路工地发现20座汉墓，清理10座，均为小薄红砖单室券顶墓，传出器物有陶罐、陶纺轮、玛瑙珠、铜镜、铜勺、铜镞、铜盘、五铢钱。

2003年6月初，由县文化局与博物馆联合抢救清理原五里乡二桥灰场一座汉墓，为小薄红砖单室券顶墓，传出器物共54件，分为陶壶、陶瓶、陶连罐、陶樽、陶三足釜、陶钵、陶灶、陶屋、陶井、陶杯、陶器盖、陶纺轮、铜镞、铜镜、铜钱、珠饰，该墓清理报告发表在2004年《广东文博》。



二桥灰场汉墓部分出土文物



陶灶



陶井

2004年2月，在徐城贵生路西南侧南坛园村发现汉墓传出的文物有红色、蓝色玛瑙珠、水晶珠，雀纹陶困盖，陶罐、陶纺轮、陶猪、陶俑、陶壶、铜洗。



雀纹陶困盖

## （二）徐闻汉墓及出土文物

徐闻汉墓发现始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发现的是以华丰岭为中心及附近的港头、二桥、南山等村庄。到了70年代初，从西部沿海的田西、瓜藤村起，向东到海安镇的红坎村，向北纵深到南山镇的槟榔埭村（离海6公里）。80年代文物普查，纵深进入县城华建糖厂、石岭潘宅、角尾乡南岭。90年代，纵深进入迈陈镇英斐、海安镇广安、徐闻英舍埭、南山二桥东岗岭、那涧等。2000年后，汉墓发展纵深进入下桥

镇公路收费站、那里、城北文丰园，东部至龙塘镇那泗村，据不完全统计，约有 350 座左右。

### 1. 徐闻汉墓的形制结构特点：

- (1) 土坑墓；
- (2) 单室券顶长方形砖室墓；
- (3) 珊瑚石室墓；
- (4) 均无封土；
- (5) 唯广安汉墓有墓主。



陶 俑

徐闻尚未发现砖木合构墓、土坑木槨墓，但珊瑚石室墓别具特色。

### 2. 徐闻汉墓和随葬器物的特点：

(1) 徐闻汉墓随葬品数量小，种类少，质地一般，级别不高，没有漆器、金器、琥珀器。但有石器、铁器，如石铤、石斧、铁鱼钩、铁剑、铁削、银器。尚未发现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 6 件，三级文物 60 件。兵器体现了汉徐闻港的军事价值，而鱼钩类则反映了汉时的渔猎文化。

(2) 徐闻汉墓中出现陶屋、陶俑，但量少，规格不高，没有楼阁型三合式、四合式陶屋。仅有一座一开间的悬山顶陶屋和一对舂碓俑。但陶罐类别多，拍印的纹饰丰富多样。汉墓中传出陶牛、陶鸡、陶朱雀、陶猪，其中陶牛与广州沙河顶汉墓，佛山澜石东汉墓出土的陶牛风格一致，陶猪与 2012 年 7 月在广州动物园发现的东汉大型砖室墓 M4 随葬的陶猪相类似，反映了汉代徐闻农业社会的一个侧面。

(3) 徐闻汉墓墓砖大部分为小薄红砖，质地疏松，属西汉，而东汉墓砖规格变大变厚，灰红两种胎质，火候高，拍印几何纹丰富多样。徐闻汉墓出土的“宜官”“大吉”“吉羊”印纹砖，与 1965 年—1966 年在广东韶关西河西汉墓葬出土的“大吉”“君宜官”“大吉昌子孙长”等吉祥语纹砖意义相似。

(4) 徐闻汉墓出土的汉印表明墓主的身份与品位。在海安镇广安村新莽墓出土的“张己印”，稍小，仅 1 厘米见方，桥钮。应属“私印”，年代为东汉，此印形制独特，精小，是罕见的汉印珍品。

### (三) 徐闻汉墓文物解读

#### 1. 琥珀、玛瑙、琉璃和珠饰是汉代海外“舶来品”。

在徐闻汉墓中出土的各种珠饰，形状大小不一，种类主要有琥珀、玛瑙、琉璃、水晶、紫晶、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等一共 368 粒，其中 1973 年省考古队挖掘的 51 座汉墓中，就出土了 308 粒。在广东省博物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专题展》中，就展出一串由徐闻汉墓出土的各种珠



汉代玛瑙珠饰

饰。它们都是随葬的装饰物品，虽然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色彩仍鲜丽，晶莹剔透，其精致的装饰工艺具有浓郁的异国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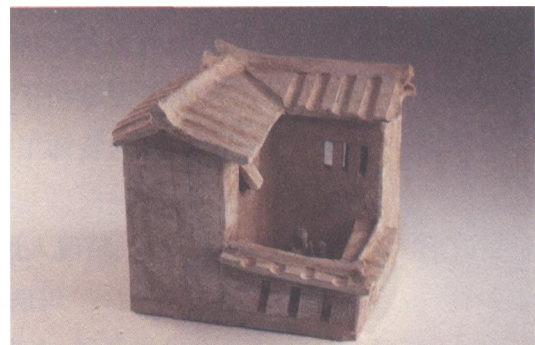
琥珀，《本草纲目》云：“虎死，精魂入地化为石此物状似之，故名琥珀。”《三国志·魏志》载“大秦（罗马）多产琥珀”。玛瑙是一种胶体矿物，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魏文帝《马脑勒赋》云：“马脑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又《三国志·魏志》、《唐书·拂林传》均谓大秦多玛瑙。琉璃，古代称流离、琉琳、繆琳、琅玕等，现称玻璃，最早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地区。

据史料载，“岭南地区近海、多犀、象、玳、珠、银等，中国往商者多取富”，指的是汉代商客主要靠经营这些岭南特产而致富，当时岭南各地均未生产琥珀、玛瑙、琉璃、水晶等物品，那么这些价格昂贵的海外装饰品，又是如何传到中国的呢？《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亦利交易。”从以上史料及汉墓出土的珠饰都证实一点，那就是汉武帝时，大量使者携带贵重的黄金和精美的丝织品，往南亚诸国进行贸易，并购回“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作为朝廷贡品而献给皇室、王公贵族、地方富豪官宦使用玩赏。这些海外珠饰的出土，不但反映了汉代徐闻的经济繁荣，而且折射出两千多年前汉港的外贸景象，为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徐闻古汉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物证。

## 2. 陶屋是汉代岭南特色建筑的缩影。



陶屋（一）



陶屋（二）

二桥村那涧闸东坡汉墓出土一座陶屋，灰陶土烧制，屋通高 23 厘米，宽 21.5 厘米，属于典型的悬山顶曲尺式陶屋，屋正面有门窗、围墙和狗洞，背墙饰方格纹图案，屋内置二个杵舂的陶俑，人物动作形象生动。徐闻二桥村那涧堰闸东坡汉墓出土的陶屋，《岭外对答》中曾记载：南方岭南山庄农舍“上设茅屋，下豢牛棚，棚上编竹为栈，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不得安”，可见干栏式建筑是岭南人早期住宅的最佳选择。这座陶屋外观设计整齐有序，富有变化，极显岭南特色和价值。陶屋设计上讲究美观而又不失实用，上居人下圈畜，这样主要是针对岭南的气候特点而设计的，人居上，通风透气，

自然舒适，少生疾病；畜圈下，避免另盖畜舍，亦便于饲养，其余地方可作劳动作坊，陶屋有狗洞，是为牲畜出入而设。虽然今天汉代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但从这座出土的陶屋中仍可见汉代人民生活的缩影，为我们后人研究汉代（尤其是岭南）的房屋建筑及相关生活习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 3. 铺首是汉代岭南铸造艺术的珍宝。

铺首又称门铺，是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物中门的装饰构件之一，主要用于启闭门扉或叩门，也普遍适用于青铜器、陶器、瓷器、画像石上。徐闻二桥汉墓出土的铜铺首，兽面衔环式样，大小形制相同，兽面纹双目突出，环形鼻衔铜环，这两件铺首均为墓道木门饰环，置于墓中封门前。铜铺首环比较完整，器形厚重端庄华贵，怪兽纹形象造型生动，形神兼备，纹饰图案精美。它与广州南越王墓和广西北插江盐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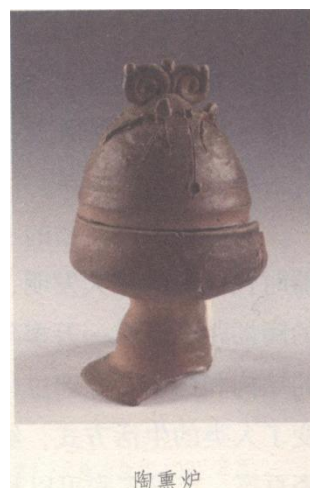
铜铺首衔环

铺首环的铜铺首环形制相似，反映了当时南越文化在徐闻具有一定影响，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几千年前门饰艺术，还透露着属于岭南特有的文化精髓。

关于铺首的起源，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中认为，铺首是春秋时期鲁班仿照蠡（一种螺蛳）的形象而发明的。门铺首初始多为实用，后来逐渐成为古人对兽类图腾的崇拜，铺首的形制多样，有椒图、饕餮、虎、狮、螭龙、龟蛇等兽类。样式大多为圆形，六角形或八角形。材料主要以青铜、黄铜、铁打制作成，古代有帝皇宫殿大门还以金银为材料，配于龙凤图案打制铺首，彰显皇家权力、气势。铺首除了叩门实用性外，还具有驱邪镇宅，祈福保平安之意。清代《字诂》：“门户铺首，以铜显兽面衔环着于门上，所以辟不祥，亦守御之义。”“兽面衔环辟不祥”。

### 4. 徐闻汉代陶熏炉。

2003年6月8日，徐闻县文化局、博物馆在原五里乡二桥村后灰场清理了一座汉代墓葬，发现了20种54件汉代陶器和铜器，其中陶熏炉一件，残，通高17厘米，底径8厘米，腹径11厘米，盘足，施青釉，是一件用来熏香的器皿，与博山炉同样的用途。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物，其与1953年在广州大元岗出土的东汉釉陶盘式熏炉相类似，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交流的佐证资料。



陶熏炉

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香药之路”“青铜之路”以及“珠宝之路”。陶熏炉既是陶瓷之路的证物，也是香药之路的证物。

中国古代文化人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一种很美的意境就来自“红袖添香伴读书”。这香是如何来的呢？“焚香取味，不在取烟”，严格地说，不是焚香，而是熏香。即借助炭



火之力让香丸、香饼散发香味。在先秦西汉时期，主要是直接选用香草、香木块等，但熏香都是用木炭等燃料熏焚。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制作精良的熏炉。到了魏晋唐时，合香才盛行。这时熏香的风气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了相当优雅的生活方式。

汉代开辟了丝绸之路后，原产自非洲和西域地区以及边陲的各种香药进入中国，诸如龙脑香、青木香、乳香、降真香等，这些异域香药的芬芳不同于中原地区人们常用的香草，它们征服了中国人的心，古代中国人的香芬生活也愈加丰富。那些原产于地中海一带的浪漫香草“rosemary”（拉丁名意为“海洋之露”），早在汉代就已经来到了中国。这些香药最上乘的莫过“沉香”，在中国人的香谱中，它是“香中阁老”，香之极品。因其内含树脂，质地密实，入水能沉，所以得名“沉水香”，古代人也曾称之为“木蜜”。它还有个美好的名字叫“女儿香”。据说在盛产沉香的广东东莞和海南岛，沉香的洗晒由姑娘们负责，她们常将最好的香块偷藏胸中，用以换取脂粉。于是香中极品“女儿香”便由此得名。

天然沉香相当稀罕，它的形成有很多偶然性，没有哪种香树必定会结香。常常是香树根干处因虫蛀或外伤等原因有真菌侵入寄生，才会引起树体内的一系列变化，使树脂、树胶等成分逐渐沉积，形成香结，时间愈长，品质就愈好。而天然香树一般要到十年或数十年以上才有发达的树脂线，才有可能形成“香结”，“香结”也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真正成熟。有的香树寿命长达数百年，倒伏后留存的沉香往往也有数百年以上的年龄，所以古人称沉香是“集千百年大地之灵气”。

汇集了中原、边陲、域外的香草、香药，古代的中国人就会变着法子炮制香味。《陈氏香谱》中有此一文：“沉香一两，苏合香。右以香投油，封浸百日，入蔷薇水更佳。”其中“苏合香”产自土耳其、埃及、印度等地，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异域香药之一。“蔷薇水”就是阿拉伯玫瑰香水，将沉香浸泡在香水中，真是典型的“中西合璧”。这些微妙、自然、清淡、绵长隽永的香气，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平添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积淀。

## 5. 徐闻汉代陶器。

陶器是古代文物的一个大类，内容相当庞杂。陶器有非常古老的历史，它是新石器时代前夕的伟大发明，从而成为新石器时代肇始的重要标志之一和一大特征。最早的陶器距今已有一万多年。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了物质的结构和性质，即通过化学变化，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型物质。陶器的出现，显著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没有任何一类文物的数量和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可以和陶器相比。

古代陶器是古代艺术的凝聚物。大量的古代陶器遗存中蕴含着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情感和工巧，不乏艺术精品。陶器文物有它独具的审美特征，与其他文物相比，它更显朴实、粗放、醇厚、古拙、简洁、活泼、志趣、素雅，往往带有民间艺术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大众化倾向，形成多种艺术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大众化的倾向，形成多种艺术风格。陶器艺

术奠定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基石，陶器文化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先河，陶器是其他文物艺术之母。古代陶器是无与伦比的。

秦的统一，使陶器的发展也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趋势。汉代的发展和强盛，使汉文化的所及，达到了相当广大的范围，在陶器上也有显著的反映。这种统一的加强，主要是在汉武帝以后才更明显。

在陶器发展史上，秦汉时期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陶俑的发展和陶俑艺术的成熟。另一个杰出的成就，是低温釉陶的发明。秦汉时期陶器仍然是泥质灰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其他的陶系，如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夹砂灰陶、泥质黑陶。

在中国古代陶器中，有一类似几何印纹为特点的陶器，他们主要流行于我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汉代，其间颇为长盛不衰，形成了很强的力量和阵势，并且直接影响到瓷器的发明，传播到中原、西南及东南亚地区。

人们公认，几何印纹陶遗存与古代越族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它就是古越人创造的。陶器文化，早期的印纹陶纹饰以拍印和刻印为主要装饰方法。主要是以几何形纹样为特征的，是具象基础上的抽象图案化。印纹陶的纹饰可以归类为编织纹、曲折纹、格形纹、圆形纹、波形纹、条纹、云雷纹、叶脉纹、齿形纹、绳纹、爪形纹等。早期多阳纹，晚期多阴纹。

徐闻汉代陶器形制多样，有陶瓷、陶罐、陶壶、陶鼎、陶钵、陶杯、陶簋、陶井、陶屋、陶灶、陶拍、陶熏、陶碾槽、陶禽畜、陶俑……胎质分为灰胎与红胎，间或施釉。纹饰变化奇特，丰富多彩，与远古陶文化一脉相承，并彰显其时代特点。

### 参考书目：

- [1]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 [2]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 [3] [清]袁日省集编：《汉印分韵合编》，上海书店 1979 年版。
- [4] 刘一闻著：《印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 [5]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 [6] 王俞春：《中国历代官署官名辞典》，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2001 年版。
- [7] 龚展著：《印纽漫话》，上海书店 1994 年版。
- [8] [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9] 傅京亮：《“红袖添香”添啥香》，《中国西部民俗研究协会古代铜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 [10] 熊寥：《陶瓷美学与中国陶瓷审美的民族特征》，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
- [11] 杨力民编著：《中国古代瓦当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6 年版。
- [12]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13] [清]檀萃：《楚庭稗珠录》。
- [14] [汉]司马迁：《史记》。
- [15]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 [16] [汉]班固：《汉书》。
- [17]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
- [18] [晋]陈寿：《三国志》。
- [19] [清]阮元：《广东通志》。
- [20] [清]郝玉麟：《广东通志》。
- [21] [明]欧阳保，[清]雷如海：《雷州府志》。
- [22] [清]王辅之：《徐闻县志》。
- [23] 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3 年版。
- [24] 陈立新：《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南方出版社 2009 年版。
- [25] 徐肖南、施军、唐笑芝编译：《东方的发现——外国学者谈海上丝路与中国》，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1 年版。
- [26] 黄鹤、秦柯：《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1 年版。
- [27] 谭元亨：《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1 年版。
- [28] 谭元亨、洪三泰、戴胜德、刘慕白著：《千年国门——广州 3000 年不衰的古港》，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7 年版。
- [29] 陈永正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1 年版。
- [30] 杨豪：《岭南民族源流考》，珠海出版社 1990 年版。
- [31] 林雅杰、陈伟武、亚兴合编：《南越陶文录》，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年版。
- [32] 叶茂林：《陶器欣赏》，漓江出版社 1995 年版。
- [33] 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8 年版。
- [34]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文史杂志社 2002 年版。
- [35] 中共徐闻县委员会、徐闻县人民政府编：《海上丝路探秘》，2001 年版。
- [36] 邱立诚：《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37] 韩湖初：《合浦汉代文物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 [38] 《广东文物》，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2001 年版。
- [39] 《广东文物考古资料选辑》第一、二辑，广东省博物馆。
- [40] 《广东文博》(1-2)合刊，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1991 年版。
- [41]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博物馆编：《广东文物普查成果图录》，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0 年版。
- [4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1 年版。
- [43] 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开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44]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册——广东分册》，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89 年版。
- [45] 广东省文物管理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1 年版。

只供阅读



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在考察现场



国家文史馆专家朱家溍先生在贵生路汉墓考察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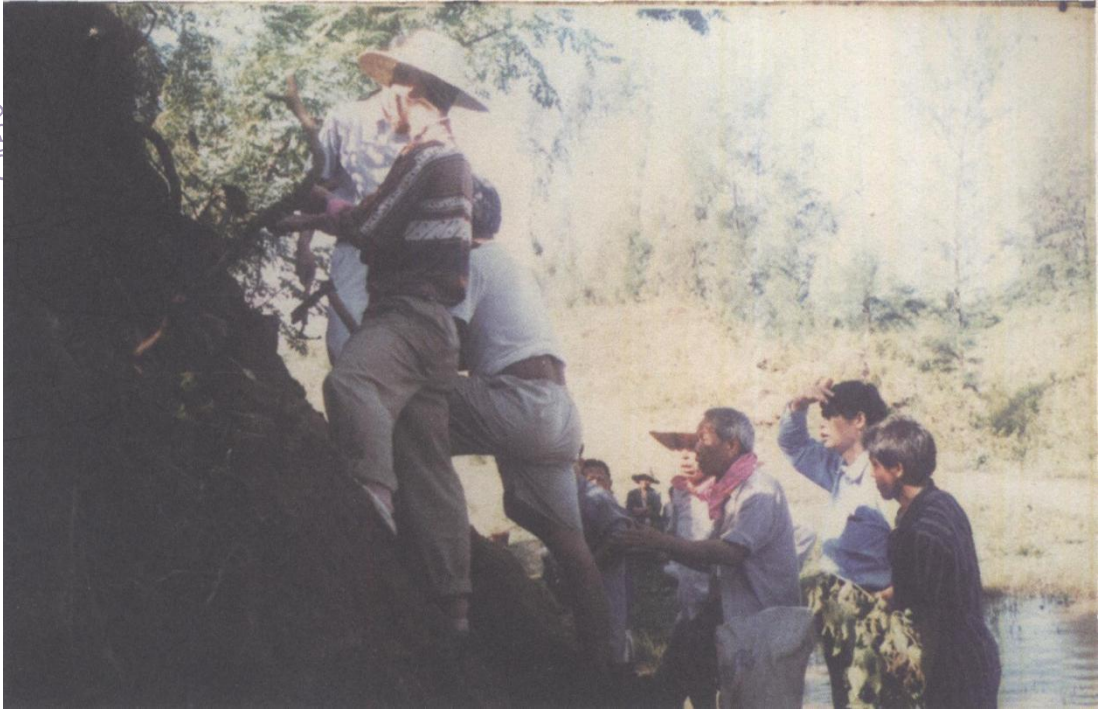


贵生路汉墓考察现场（一）



贵生路汉墓考察现场（二）

只供阅读  
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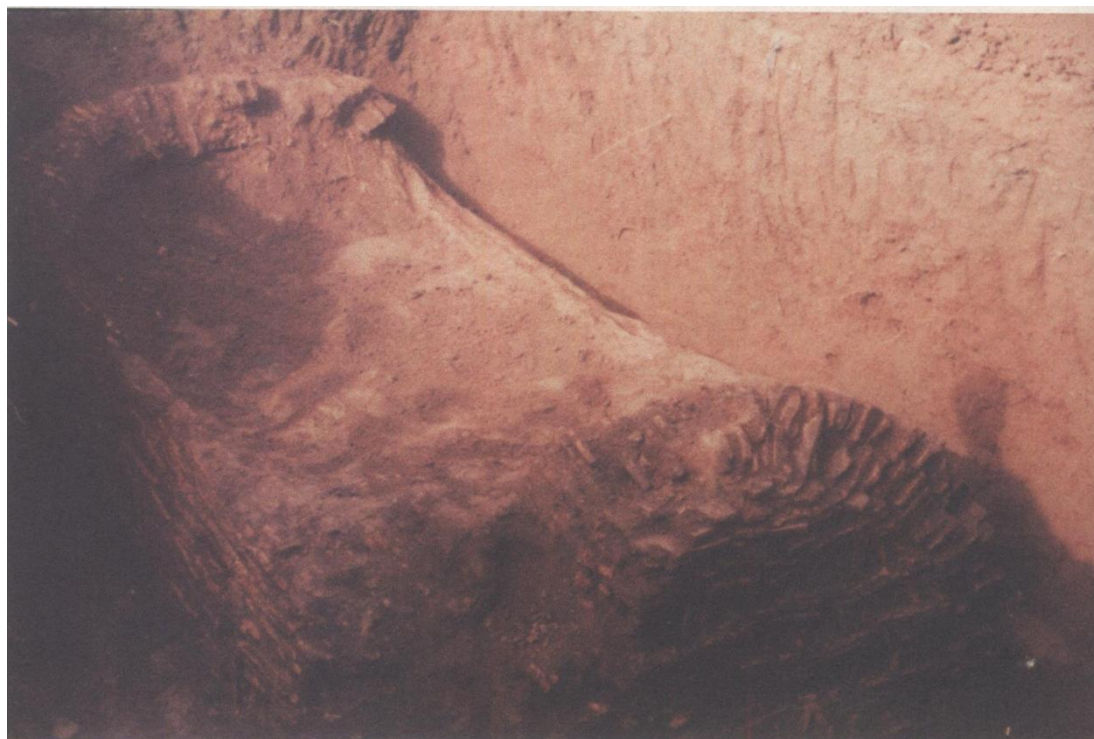
那涧堰闸东坡汉墓清理现场



二桥探沟现场



那涧沟东岗岭汉墓



贵生路汉墓